

September 2017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iterary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Yonghe L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u, Yonghe. 2017.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iterary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206-2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论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四个维度

卢永和

摘要: 记忆、历史和文学三者的本质共相是基于现实语境对“过去”的一种有意建构(重构)。狄尔泰认为,不同的“精神科学”在“体验”和“理解”之基础上共同创构一个“生产关联体”的精神世界。作为两个不同的精神“关联体”,文学与历史相互阐发,共同创造一个整体的意义系统。安克施密特的“叙述实体”概念是一个对“过去”的不同叙述的集合体。“叙述实体”非指称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是意指历史的“图像”或“隐喻”。“叙述实体”的思考路径为我们架起一道沟通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桥梁。人类的“共同体”生活以“记忆共同体”为表征,“共享的记忆”需要人为建构。作为共享记忆规范化与正统化之结晶,“文化文本”是一个身份认同和历史传统的象征符号。

关键词: 文学记忆; 历史意识; 生产关联体; 叙述实体; 记忆共同体; 文化文本

作者简介: 卢永和,文学博士,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电子邮箱: luyonghe1972@aliyun.com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主义视域下新俄罗斯小说历史记忆研究”[项目编号: 16BWW036]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iterary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bstract: The same essence of memor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s a deliberat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text. Dilthey argues that different “human sciences” co-create a spiritual world of “productive nexus or system”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As two different spiritual “associatio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form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reate a whole meaning system. The concept “narrative substance” of Ankersmit is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narratives of “past”. “Narrative substance” is not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history, but the historical “image” or “metaphor”. The “narrative substance” sets up for us a bridge between literary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human “community”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mnemonic community” and their “shared memories” need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As a combination of standardized and decentralized “shared memories”, “cultural text” is a symbol of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Keywords: literary memo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roductive nexus or system; narrative substance; mnemonic community; cultural text

Author: Lu Yonghe,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Arts of Guangdong Zhaoqing College (Zhaoqing 526061, Guangdong), with research mainly focusing o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luyonghe1972@aliyun.com

人类的一切意识均与记忆有关,记忆即指大脑通过储存并再现过去信息的活动,实现对客观世界与主体自我的认知。近四十年来,随着其意义的多向度开掘,记忆研究已渗透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聚合性论题。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或重构,记

忆属于文学的基本论题,不同学科与视角对记忆的认知,为“文学—记忆”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本文以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之逻辑关联作为中心论题;所谓“历史意识”,则是借鉴当代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提法。阿隆在其论著《历史意识的维度》中从“历史

的哲学”“历史意义”“证据与推论”“历史统一体”“历史解释”和“历史叙述”等多个维度探讨“历史意识”。该论著以“意识”这个关键词命名,是因为它能表达阿隆最核心的历史观:“让历史意识的概念回归到一种有关当下的历史,而根据历史意识这个观念,人类,不论其境遇和心境为何,首先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行动者”(6)。本文循其“让历史回归当下”的认识逻辑,拟从“本质共相”“认识论基础”“叙述逻辑”和“文本表征”等四个维度分述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之关联。

一、重构过去:记忆·历史·文学

亚里士多德在《论记忆和回忆》一文中指出:“感觉属于现在,希冀属于将来,记忆属于过去。因此,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所以,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借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苗力田133—34)。亚氏告诉我们:一方面,记忆是对过去事物的感知;另一方面,记忆对于时间的意识,即是所谓的历史意识。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Joern Ruesen)给“历史意识”作出这样的界定:“历史意识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63)。而雷蒙·阿隆则认为:“对于过去,我们记住的往往是我们所关涉的部分。当下向过去提出的问题主导着历史学的选择”(9)。吕森与阿隆等学者对于“历史意识”的本质理解,沿袭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等西方经典史观,即认为历史是当下对过去的回溯与建构(重构)。但“记忆”与“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则言人人殊:

提出“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这个重要概念的法国学者诺拉(Pierre Nora),虽然认为记忆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对象,但却明确指出:“记忆和历史远不是同义语,我们应注意到,一切都让它们处于对立状态”(5)。他从记忆与历史的存在状态、主体特征、认知目标和情感色彩等几个方面区分两者之差异。当代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亦表达类似看法,认为“历史中的过去不是被记住的过去。被记住的过去或许能成为历史,但并不是历史,因为它只是被

记住而已。记忆总是个人性的,我们只能记住来自我们个人经验范围内的东西”(Oakeshott 78)。简言之,上述学者对于历史的认识偏重于过去的客观实然,而将记忆理解为对过去的主观体认,故两者的意义指涉有明显差别。

与上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并非所有过去发生的事都能成为历史,只有那些对当下现实产生意义或影响的事件方能称为历史,而这样的历史恰是被我们记忆的历史。由于遗忘不可避免,我们记住的只是那些能够被回忆的历史经验,如哲学家加达默尔(Gadamer)所言:“记住、遗忘和再回忆属于人类的历史构成,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一段历史和一种教化”(19)。法国学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论及历史与回忆之关系时甚至指出:“回忆比历史更真切,更‘真实’,而历史则更像是杜撰的;回忆倚重的是对记忆进行加工,而历史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编排,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来进行的一种编排”(2)。勒高夫的观点是针对人类的记忆(回忆)活动对于历史研究之重要性而言的。而历史始于记忆之观点,亦间接获得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支持:司掌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Clio)系由记忆女神漠涅摩叙涅(Mnemosyne)所生。

介于两派之间的折衷派则认为:历史与记忆是相互依赖的,记忆是历史的特殊呈现方式,而历史的意义则在记忆中得到强化。法国学者利科(Paul Ricoeur)指出:“过去与将来可以在记忆、回忆和历史中实现二者的相互指涉”(3)。在利科看来,记忆与历史是一种张力关系,被记忆重现的过去,也就是历史认识,即在“记忆与历史话语相互指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历史的伦理性”(7)。美国“新史学派”倡导者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也注意到历史与记忆之近义性,他解释道:“我们所谓历史,同我们个人的记忆,看起来好像不同,实在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脑筋里面所记得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纯粹我们个人的经验,包括许多听来的或从书籍里面得来的东西。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11)。

概而言之,学者们在历史与记忆关系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实际上是对英国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提出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这个历史哲学总问题的不同思考与回答。在西方知识语境中,“历史”一词本身

模棱两可,既包括人类过去活动的遗迹、过程和经验,亦涵盖对它们的记载、叙述和解释。从不同视角与理念出发,史学家们在历史的本体性质、证据与史料、功能与意义、结构与形式、编纂与知识形态等方面持不同的见解与判断。大致而言,西方史学研究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派。其基本的史学观念可概括为:其一,重视史料的真实与客观性,并以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其二,历史研究与书写的目的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借以凸显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其三,注重政治史与精英人物的研究,并以之作为核心史料。另一流派则以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为代表。“新史学”派打破兰克史学的狭隘观念,极力拓展历史研究范围,在理论与方法上积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修辞学等跨学科资源,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西方史学研究由此进入现代(后现代)史学研究阶段。

借由现代与后现代史学观念之观照,具有记忆特征的神话传说、人物传记、个人日记以及艺术作品(小说、影像)等材料重新纳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在研究视野扩大的同时,历史的真实性、价值取向、文本叙述等问题亦变得更为复杂。以二战时期纳粹屠犹中的安妮·弗兰克(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故事为例:

安妮是一个德国犹太女孩,她用日记本记录下一段她和家人以及另外7个犹太人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躲藏在一间阁楼密室的黑暗生活(1942年6月—1944年8月)。这本日记于1947年整理出版后,以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二战文学作品(2009年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其间各种艺术以及传播媒介(歌曲、舞蹈、绘画、电视、邮票等)也以“安妮日记”为素材,不断重绘安妮之形象。二战结束的前两年,由于人们尚未走出纳粹暴行之阴影,安妮故事的基调是灰色与悲观的。但在舞台剧《安妮日记》(1955年)中,安妮被塑造为一个纯真漂亮的女孩形象。随后安妮形象所展示的自信、希望和快乐等正能量精神被大众传媒所渲染、强化,安妮于是作为一个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的小天使而传播于世界各地,而她的犹太人身份以及背后的历史事实反而被稀释甚或淡忘。

1984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组织一批学者搜集大量资料,编纂出《安妮日记》评注本(美国版于1989年面世),指出《安妮日记》做过无数的编辑改动,其原本永远是个谜。荷兰作家兼制片人威利·林德威(Willy Lindwer)于1991年出版的《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The Last Seven Months of Anne Frank*),记录的是一个营养不良、精疲力竭、病魔缠身的女孩形象(作者声称是根据目击者的可靠资料),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备受折磨而过早夭亡的安妮。

由上可见,安妮形象所呈现的纳粹屠犹历史记忆是模糊与矛盾的:一方面,安妮是一个犹太受难者和纳粹血腥暴行的历史见证者;另一方面,安妮形象又要给世人展示超越一切苦难的希望与信心。两个不同的历史面相如何有机协调?对此问题,有历史学者对各种艺术版的《安妮日记》提出严厉批评,如犹太大屠杀研究学者罗森菲尔德(Alvin H. Rosenfeld)指出:“安妮的经历离开了大屠杀的犹太经历根本无法解释,超越或冲淡这点将不可避免地歪曲和篡改她的经历”;“纳粹屠犹最有名的遇害者安妮·弗兰克虽说仍被记住,但记住她的方式却会有损于记忆纳粹屠犹本身的历史准确性和道德责任感”(陈恒 101—104)。罗森菲尔德实际上给艺术家提出了一道难题:如何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和传承历史记忆?美籍犹太裔作家维塞尔(Elie Weisel)亦发出类似感慨:“描写奥斯维辛的小说,要么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要么就是它写的不是奥斯维辛”(陈恒 124)。

对于记忆文学的责难与叩问,实际上关涉到记忆、历史和文学三者如何面对人类的“过去”这个根本性问题。质言之,记忆、历史和文学三者都是基于现实语境而对“过去”的一种有意建构或重构。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唤回机制,即将“过去”重新唤回到现在。过去只有经过主体的记忆、体验和解释,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也只有这样的“过去”才能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经验,并为我们的主体意识所把握。文学记忆也并非对过去事实的简单再现,而是作者参照当下的思想观念,以“回忆”的形式对过去事迹进行巧妙的组织与叙述,因为“善于回忆并不是善于调查研究,而是善于表述。如果叙述被允许兼含失实或如实两种情况,善于回忆就是一种叙述技能”(Ryle 279)。

文学记忆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恰当的历史意识,仰赖于作者对过去的认知与判断力,即如何突破个人经验囿限,从庞杂的人类历史世界中抽绎出社会存在的本质内涵。

从指涉“过去”的宏观视角,我们找到了记忆、历史和文学三者之间的本质共相。但记忆外在表现为一种心理现象,历史与文学亦分属不同学科,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实现理论对接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两者在哪个叙述逻辑层面展开内在沟通与对话?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融合互渗的文本依据何在?以上三个问题,有待下文分述。

二、文学与历史: 精神世界的“生产关联体”

从学科划分来看,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文学与历史在问题场域、理论基础、叙述逻辑以及知识形式等方面有质性差异。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对接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德国思想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观点作出回应。狄尔泰终其一生的学术目标是阐明“精神科学”(Human sciences)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本质,藉此为所有“精神科学”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他认为“精神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或者人类—社会—历史实在”(74),其共通点是“它们全都立足于体验、体验的表现以及对于这些表现的理解”(60)。“体验”和“理解”是狄尔泰贯通诸“精神科学”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精神科学”彼此渗透,相互阐发,共同创构一个“生产关联体(Productive nexus or system)”(134)的精神世界。

根据狄尔泰的解释,作为精神世界的“生产关联体”,虽以个体存在的体验与理解为基础,却彰显于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这种系统的生产性取决于客体体认、表现在价值判断中的心理状态,以及表现在确立目的、道德与规范等工作中的心理状态之间的结构性联系”(136)。可见,人类精神的“生产关联体”虽然是以个体为联结点,但实质上是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系统。“意义”由此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被狄尔泰视作贯通各文化系统(学科)的基础观念,因为它存在于人类的整个生命活动之中,精神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即是世界与人的意义关联。

从“生产关联体”的视角来看,文学与历史虽然分属不同的“关联”系统,但在对人类过去的体验、描述、解释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则呈现近似的特征:其一,两个“关联体”都是从主体当下的文化语境与现实境况出发,通过体验和理解去把握和再现人类过去的“生活/生命”过程。“过去”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而是存在于现在的生活之中;“过去”之蕴涵,随着认知主体思想观念之不断变迁而获得新的阐释。其二,在思维方式上,两者对过去的体认,均通过感知、表象、概念、选择、归纳和判断等手段,将分离、零散的客体素材聚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关联体”。某个特殊的素材只有经由一个有序的结构系统之观照,其意义才得以凸显和强化。其三,在一个共时性的精神空间中,各种不同的“关联体”受认知主体的情感态度、文化背景、利益诉求、道德规约以及宗教国族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相应形成若干个层级不同、相互碰撞的精神共同体。

在一个共享的精神世界中,文学与历史这两个“关联体”往往交叉缠绕,互相指涉,共生共存;换句话说,历史的认知观念、知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历史意识蕴含于文学记忆之中,如狄尔泰所言:“历史世界是一个以其自身为中心的生产关联体,同时它也包含着其他生产系统”(122)。对此,我们可从“记忆”的社会学视角展开分析: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与扬·阿斯曼(Jan Assmann)夫妇俩合写的一文《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从媒介视角将社会记忆划分为“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两大类,并指出:“存储记忆包含许多杂乱的因素,是一个未分类的储备。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埃尔 27);而“功能记忆作为一种构建是与一个主体相联的。这个主体使自己成为功能记忆的载体或者内含主体。主体的构建有赖于功能记忆,即通过对过去进行有选择、有意识的支配”(埃尔 27)。可见,存储记忆只是一些散点信息的积累,缺乏明确的价值指涉;而功能记忆则受主体意识规约,具有清晰的价值目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阿斯曼 147)。基于理论严谨性的考虑,他们也指出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明晰,两者往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其边界模糊难辨。

在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的分类体系中,阿斯曼夫妇将文学归于“存储记忆”类别。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妥,因为有些文学作品的“功能记忆”特征比“存储记忆”更为突出,作家们在叙事过程中有意形塑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是由作家来进行”(181)。简言之,不同的文学文本,其“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特征的表现形式与程度不一,需结合作者的创作理念、社会接受语境等因素作具体分析。我们试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中篇小说《蟹行》为例略加解释:

小说《蟹行》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海难故事:1945年1月30日,一艘载有近万名德国难民和数千士兵的“古斯特洛夫号”游轮在波罗的海被苏联红军发射的鱼雷击沉,死逾九千人。从“存储记忆”层面而言,小说再现了一个一度被人遗忘的德国版“泰坦尼克号”海难悲剧,让德国民众铭记这一个重大的历史灾难,并牢记德国人也是二战受害者的历史事实。而在小说发表(2002年)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德国人作为二战受害者的历史事实,只能封存于私人记忆领域,无法获得公众关注。从“功能记忆”层面而言,小说《蟹行》将犹太受害者整合到德国的历史记忆之中,小说由此丰富了德国民众关于二战历史的记忆图景,同时也是在新时期的政治语境中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与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存储记忆”或“功能记忆”层面,小说的记忆叙事与德国人的历史意识纠缠扭结,文学与历史两个精神“关联体”互相呼应。小说出版前夕的1995年被学者克劳斯·纽曼(Klaus Naumann)称为“回忆文化转折年”(埃尔 175),该年德国媒体掀起一股“历史记忆的回流”,即回忆二战时期德国民众所遭遇的苦难,如难民被驱逐、城市被轰炸、女性被强奸等等。从这一年开始,关于德国作为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屡屡被公开提及;而在此之前,恢复德国受害者记忆的工作未能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可,因为国际担心强调德国人的受害,会遮蔽德国在纳粹大屠杀中作为“犯罪民族”的历史事实,由此弱化德国人的罪责意识,并排挤掉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产生分歧的核心关键是,德国民众的创伤记忆能

否与犹太人受害的创伤记忆共存于民众的历史记忆结构之中。小说《蟹行》深受各界好评,正是因为克服了这个矛盾,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言:“德国民众的创伤记忆就这样通过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关联的意识而在大屠杀受害者的创伤记忆旁找到了一席之地”(埃尔 179)。

文学的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差异,亦牵涉到文学“关联体”如何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关联体”相协调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国家里总是存在着差别巨大的回忆和群体经历,问题不在于如何表述这种回忆,而是如何将它嵌入普遍联系的大环境之中”(埃尔 189)。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回忆的不一致性问题解决需要借助其等级化。等级化包括价值和权力问题。回忆总是以越来越庞大的范围和约束力的形式存在于个人、家庭、社会直到国家层面。在较低的层面无需确立规范和做出决定,但是在国家和政治层面则相反,这些事是必须的”(埃尔 189)。

对于文学记忆如何再现“复数”历史之难题,阿莱达·阿斯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即层级分类法: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层面,逐级加强历史书写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从历史书写的层级化出发,个人、家庭和部分社会群体的记忆可以自由灵活地共存于不同的文学文本,以此呈现历史图景的丰富性;但国家层面的历史记忆则必须由统一的框架所规范,由此凸显“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恰如当代美国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所言:“各国都有控制国民集体记忆的必要,因为国家若要维持安泰,就须塑造国民对历史的认识”(阿普尔比等 136)。阿普尔比明确指出集体记忆之于历史认识的特殊意义,但文学记忆与历史认识在哪个思维逻辑层面实现内在沟通与对话?此问题可从文学与历史的叙述逻辑这一视角展开分析。

三、历史的“叙述实体”： 集体记忆的文学书写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突破对记忆的心理学解释,认为“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社会建构”(59)。通过分析家庭、宗教、民族、阶级、社区等群体组织

对个人记忆的制约作用, 哈布瓦赫提出他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观: “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 它本身就只可能是集体性的了; 对于个体来说, 仅仅凭借他自身的力量, 是不可能重新再现他以前再现的东西的, 除非他诉之于所在群体的思想”(284)。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开启了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为我们分析各种记忆现象的社会属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 他的“集体记忆”理论存在许多粗糙与模糊之处。譬如, 个体记忆首先表现为一种私人经验, 并不是同质的, 而集体记忆在理论层面却被整合为一个均质的整体, 由此引发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具象化层面,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两者之间如何建立内在关联? 另外, 作为一种“对过去的社会建构”, “记忆”依赖不同的载体或媒介, 其中既有“硬记忆”载体, 如历史纪念碑、公共建筑、纪念馆、博物馆等; 亦有历史、文学、声音、影像艺术等“软记忆”媒介。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 各种记忆载体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所发挥的功能与强度有何差异? 进而言之, 同是以文字文本为表征的“软记忆”, 文学与历史所建构的“过去”应当如何体认? 两者建构“过去”的思维逻辑有无共通之处? 我们如何评判文学记忆所呈现的历史意识? 诸如此类问题, 我们试以“文革”文学为例作出解释:

学者许子东抽取 1977 年以后发表的五十部(篇)小说作为样本, 归纳出文革小说的四种基本叙述类型: “一、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 二、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坏事最终变成好事’); 三、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很多好人合做坏事’); 四、‘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我也许错了, 但决不忏悔’)”(154—55)。许子东认为这些重复讲述的故事巩固了民众对“文革”的记忆及其意义的理解: 在四种文革记忆书写中, “‘文革’或者被描述成一场‘少数坏人迫害好人’的灾难故事; 或者被总结成一个‘坏事最终变成好事’的历史教训; 或者被解析为一个‘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谬坏事’; 或者被记录为一种‘充满错误却又不肯忏悔’的青春回忆”(206)。

诚然, 当小说家们以不同的意义模式和叙述

逻辑将个人的文革体验转化为文学故事时,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 实际上有意无意参与了文革集体记忆建构工程。这些故事叙述模式的相同或近似, 表达的是文革记忆的“集体性”征象。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些文学书写与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历史本质、历史叙述、历史解释等) 具有何种关联? 对此, 我们可以征用当代荷兰史学家安克施密特(F. R. Ankersmit) 的历史学核心概念——“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 加以解释。

受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之影响, 安克施密特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认识论层面转向文本语言叙述层面。“叙述实体”是安克施密特在其论著《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解释, “叙述实体”的概念不是指称过去的客观实然, 而是意指对过去的叙述与解释。“叙述实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个对过去的不同叙述的集合体(安克施密特 102)。譬如, “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冷战”、拿破仑等等, 都是“叙述实体”的专名。作为一个历史叙述分析的概念工具, “叙述实体”与普通所谓的历史叙述的意涵迥乎不同, 它并不指涉“过去”的全部事实, 也不将“过去”视为一个具有清晰轮廓的自然实存。从“叙述实体”的理论视角来看, “过去”的面貌及其意义仅存在于各种关于它的“叙述”之中。由此, 语言叙述在历史认识与研究中取得本体地位, 此即历史哲学中的语言学或叙述学转向, 而这也意味着历史认识与文学记忆的理论对接与互通。安克施密特的“叙述实体”概念虽是针对历史学而发, 但它对于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之逻辑关联的理解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的“叙述实体”相当于历史的“图像”(images) 或“图画”(pictures), 不是“过去”之本身; 易言之, “叙述实体”赋予过去以特定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对于历史的认知作用, “‘叙述实体’的概念就好像是几何学中的一条辅助线: 我们设想它,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解决如此多的缺少它就难以解决的问题”(安克施密特 260)。如果我们将“文革”文学视为一个“叙述实体”, “文革”文学所表现的历史思维特征、史料价值、历史意义等问题则能够获得圆通的解释:

首先,从“叙述实体”而言,由不同作者讲述的文革故事,或为历史见证,或为政治控诉,其客观真伪无从考证,但也不需要考证。因为“叙述实体”的“真陈述”(true statements),注重对过去事实的解释,而非过去的事实本身。同理,作为一个“叙述实体,“文革”文学为读者大众提供的是关于“文革”的“代理经验”或“图像”。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哪部文学作品所描绘的文革“图像”效果最佳,最有可能被接受。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献和历史教科书对“文革”叙述讳莫如深的情况下,“文学”一度成为保存文革记忆的主要方式。即便如此,“文革”文学也不能被视为兰克史学意义的“史料”,理由很简单:“图像”只是事物的“投影”,而非事物本身。

其次,“叙述实体”相当于一个话语系统,其中夹杂许多“私人”语言,但对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握它的整体结构。“叙述实体”作为一个叙述集合体,由诸多叙述单体构成,其中叙述单体与“叙述实体”之关系,与文学中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关系,具有内在对应性。文学化的个人记忆,往往根据自身遭际和实际需要来回忆自己的过去,并帮助我们形成对过去的整体感知,其中必然经历“选择性”“理念化”等艺术提炼过程,由此避免个人记忆的碎片化。文学叙述中的个体记忆,离不开特定的现实语境、制度规则等公共交流框架。读者大众的心理与情感诉求、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等多种因素绞缠交叠,综合形成文革叙述的整体结构,正如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言:“我们反复需要‘相同’的故事,以此作为维护我们文化中的基本意识形态的最有力的一种方法”(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72)。倚赖于“文革”文学的主题类型、故事模式、叙述策略以及语言形式等要素的综合分析,我们能够挖掘“文革”文学共享的叙述结构及其历史蕴涵。

总体而言,“叙述实体”的概念凸显了“叙事”在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中的本体地位,为我们架起一道沟通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桥梁。从历史认知的层面而言,文学记忆面对的不是“纯粹”的过去,记忆文学研究的旨趣也不在于评判文学文本是否符应客观的过去,而是探究写作主体如何建构关于过去的话语生产逻辑,然后循此挖掘话语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集体心理等

一整套复杂的意识生产机制。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的“共同体”存在形式的视角深入探讨。

四、“文化文本”:记忆共同体与历史传统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人的共同体”(马克思 恩格斯 394)。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以“共同体”(community)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不同社会“共同体”的聚合与延存,则需要内部成员具有若干“共同性”因素,如血缘、地缘、利益、语言、信仰以及历史传统等等。“共同体”作为一个概念范畴与理论工具,被诸多学科征用,由此造成它的意涵含混模糊。譬如,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的理论阐释模式是基于西方殖民活动和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视角,分析对象主要为东南亚、美洲等有过殖民地历史的民族与国家,其对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及中国等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则不具理论说服力。

实际上,首次系统探讨“共同体”这个概念的学者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他在其经典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将“共同体”和“社会”理解为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共同体”生活是“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它的本质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52),表现为空间和精神上的接近。具有约束力和默认一致(consensus)的本质意志是人类结合为“共同体”的精神基础。滕尼斯将“记忆”视为本质意志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之一,即“作为从感觉和经验中抽象的各种理念的总体的表现,理念的总体包括重复有的放矢的和良好的活动的的能力”(iv)。滕尼斯亦认为“本质意志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从中解释,形成中的事情如何从它而来”(147)。“共同体”概念由此与历史意识产生关联,被理解为“整个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的持久类型”(333)。综上所述,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具有“记忆”和“历史”两个向度。

“所有人类群体都有对过去的认识,但他们

都倾向于用它来强化自身的信念和认同感”(托什 1)。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认识,历史既关乎“我(我们)是谁?”等自我与集体身份认同问题,亦牵涉到“我(我们)向何处去?”的未来命运问题。对共同的来历与过去的记忆,则是人类“共同体”聚合的精神基础。对此,当代以色列学者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著述《记忆的伦理》中使用的“记忆共同体”概念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玛格丽特将人际关系分为两种:“浓厚”关系和“浅淡”关系。“浓厚”关系从属于伦理;“浅淡”关系从属于道德。记忆属于伦理范畴:“记忆如同黏合剂把具有浓厚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因此记忆共同体是浓厚关系和伦理的栖息地”(玛格利特 8)。“记忆共同体”之形成,有些是自发的,如邻居、家庭和家族等;有些则是“社会建构物”,如宗教社群、民族和国家等。本文讨论限于后者。

为凸显集体意志在“记忆共同体”中的规约作用,玛格丽特创造了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共享的记忆”。“共享的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和调整记忆主体的不同视角,让过去的亲历者及后来的非亲历者都能认同一个完整的“记忆版本”。如此一来,“作为某个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我的记忆与上一代人的记忆具有关联性,前代人的记忆又依次与其前代的人的记忆有关联,依次类推上溯至我们与其分享同一事件记忆的那一代人”(玛格利特 53)。循此逻辑,“作为超越了当代人经历的历史性事件的共享记忆是记忆的记忆”(玛格利特 54)。从历史认识论而言,共享记忆的落脚点不在历史事件,而在于对它的解释。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也是一种“未开放的记忆”:“通向该事件的唯一路线,如同记忆的宗教路线,被共同体的传统权威所刻画。描述原初事件的其他历史路线可以被容忍甚至受到欢迎——只要它们是在确认传统记忆的说法,然而,一旦与共享记忆的传统路线矛盾或冲突,这种路线就会被禁止”(玛格利特 54)。过去的历史事件及其背后隐含的情感、观念、价值和信仰等精神蕴涵,以共享记忆的方式被权威化和神圣化,由此形成所谓的历史传统(正统)。

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和权威”(柯林武德 232)。历史的“权威”仰赖共享的记忆来完成,但共享记忆作为一种社

会性记忆,并非自然天成,而需要人为的建构或有意识的操控,且有赖于人类记忆工具与记忆技术的发展。在无文字的远古时期,讲述历史事迹的共享记忆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或史诗等形式传承,这些艺术性的口头故事与历史合二为一,且代代层累重构。讲故事的重任由说唱艺人、吟游诗人等“活的记忆者”承担,因为他们最擅长“声音的记忆”。

文字的出现,开辟了人类新的记忆空间,书写文本成为记忆存储的重要媒介,识文断字之人成为记忆的管家。他们将灵活变异的口传故事编定为固化文本,从而实现集体记忆的规范化与统一化,文献与典册等成为操纵集体记忆的场域空间。记忆之争,即政治权力之争,撰史、文献编订等工作因此受到统治阶层的褒奖,正统史观亦由此产生。另一方面,文字符号作为一种记忆存储工具,其命意、谋篇、连缀、修辞等文法技巧,可以充分发挥记忆“魔法”之功能。我们能发现一类文学与历史“合二为一”的特殊文本,其记述的故事与人物经由文学艺术的提炼与提升,更容易植入后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由此汇入一个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谱系。兹举如下:

《荷马史诗》的内容来源于古希腊人记忆中的古代歌谣、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等,亦以若干史实为据,故兼有文学、历史、考古和民俗学等多重文化价值。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ius)创作的第一部欧洲“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埃涅阿斯建立罗马帝国的国史题材。对于埃涅阿斯的历史记忆,暗含古罗马文明的历史荣耀。《圣经》一方面代表基督教文化传统,与古希腊文化共同组成西方文化的源头与母体,另一方面亦被视为英语文学的“奠基性文本(the most foundation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texts)”(梁工 45)。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建立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传统,其中的刘邦、项羽、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形象,构筑一道道中华历史人物的美丽风景,亦为后世文学再创作提供灵感源泉。

为凸显此类文学与历史“二合一”的特殊文本与普通文学文本的差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以“文化文本”这个概念来指称它们。他从“身份认同”“接受关系”“创新表达和经典化”“超越时间性”等四个方面探讨纯“文学文本”与

“文化文本”之根本差异：其一，“身份认同”方面，“文学文本的对象是作为个人和独立主体的读者”，读者阅读“是一个消遣和领会的过程”；“文化文本的受众则是作为群体代表的读者，[……]对文化文本的阅读表明了读者所属的某个特定群体，是一种超越主体的身份认同感的保证”。其二，从“接受关系”而言，“文学文本需要一种审美距离，它体现了一种不受约束的事实”；文化文本则“需要崇拜、反复学习和富有感情的接受关系。[……]这些文本不仅能供人阅读，引起思考，还能为灵魂提供住所”。其三，就“创新表达与经典化”而言，“文学文本的创作动力就在于其本身的创新与陈旧、遗忘、排挤的互补运动之中”；而“文化文本都是经典化了的。[……]这些经典化的文本永远不会陈旧，它们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自我更新”。其四，就“超越时间性”而言，“文学文本处在开放的历史视野之中。[……]文本的接受命运完全取决于偶然，取决于后世是否有兴趣有准备继续关注它”；而“文化文本处在封闭的传统视野之中。在这个视野内，它要求永世不竭、永不过时的现实意义”（埃尔 140—41）。简言之，“文化文本”是一个共享的精神符号，读者对它的阅读，重在分享一个共同的记忆，寻求一份集体灵魂的认同。“文化文本”拥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力量，能使文本承载的精神动能，伴随后人的阅读而储存于一个记忆共同体之中，并参与形成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

阿莱达·阿斯曼提出“文化文本”这个概念，意在解释文学文本如何承担文化记忆功能的问题，但同时也阐明了文学作为“软记忆”媒介在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作用。明乎此，我们不由想到一个古希腊的历史趣闻：“当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位于西给乌斯的阿喀琉斯的墓旁，他泪流满面，说起阿喀琉斯的幸运，这是不朽的荷马的诗句所赋予他的”（阿斯曼 37）。亚历山大在此不是赞赏英雄阿喀琉斯的荣耀，而是诗人荷马的荣耀；他之所以黯然流泪，是担心再也找不到荷马那样伟大的诗人来颂扬自己的光荣事迹，由此走向被人遗忘的坟墓。正因为如此看重诗人在历史记忆中的作用，亚历山大在缴获波斯帝王大流士藏在银制宝箱的荷马的两本书之后，一本整天捧在胸前，另一本夜里放在枕头下边。可见，优雅的诗句是一种高级的记忆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历史记忆的大师。

结 语

自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兴起以来，“让历史回归当下”的历史观逐渐成为现代（后现代）史学研究的主流。基于当下社会语境对“过去”进行有意建构（重构），是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本质共相。历史世界是一个由诸多“生产关联体”共同建构的精神空间。作为两个不同的精神“关联体”，文学与历史共生共存，互为映照，共同创造一个以“体验”和“理解”为基础的意义系统。作为史学研究叙述学（语言学）转向的标志，阿克施密特的“叙述实体”概念突出“叙事”在历史认知中的中心地位。历史的“叙述实体”不是指称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是意指历史的“图像”或“隐喻”。“图像”“隐喻”等修辞语言的共用，意味着历史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内在贯通，记忆文学对于“过去”的描述由此具有历史内涵。“共同体”是人类基本的存在形式，人类的“共同体”生活以“记忆共同体”为表征，其内部成员的情感取向、身份认同和价值信仰等观念，经由“共享记忆”而融汇成历史传统。历史传统的传承亦有赖于一类“文史合一”的“文化文本”。“文化文本”储存于一个“记忆共同体”之中，成为该群体的身份标识与文明符号。

对于文学记忆与历史意识问题之探究，以上所论仅仅是一个理论勾勒，许多问题尚待细化深掘。譬如，能否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视角探讨两者之关系？针对“如何使文学作品成为集体文本”的问题，德国学者埃尔（Astrid Erll）提出“集体记忆的修辞学”概念（埃尔 244）。而近年来史学界倡导“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将历史研究的重心由理性行动转移到情感、情绪（affect）、感情（feeling）等感性活动层面（王晴佳 127—30），亦为本论题的后续研究开辟新的空间。总之，本论题内涵丰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联盟合作。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Assmann, Aleid. *The Memories of Space: the Form and*

- Vicissitude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 Pan 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 [Appleby, Joyce,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Trans. Liu Beicheng and Xue Xua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9.]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叟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Aron, Raymond. *The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rans. Dong Ziyu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Collingwood, R. G.. *The Idea of History*. Trans. He Zhaow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陈恒主编:《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
- [Chen, Heng, ed.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7.]
- 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狄尔泰文集·第3卷),安延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Dilthey, Wilhelm.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Vol. 3)*. Trans. An Yanm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Erll, Astrid, 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A Reader*. Trans. Feng Yal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Vol. 1. Trans. Hong Hand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i Ran and Guo Jinhu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蔡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Jorn, Rusen.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History*. Trans. Qi Jiafu and Lai Ji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Le Goff, Jacques.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Fang Renjie and Ni Fus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entricchia, Frank,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梁工编:《圣经文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 [Liang, Gong, ed.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7.]
-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 [Margalit, Avisha. *The Ethics of Memory*. Trans. He Haire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 [Miao, Liti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3.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Nora, Pierre, ed. *Realms of Memory: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rans. Huang Yanho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Oakeshott, Michael.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保罗·利科等:《过去之谜》,蔡甲福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 [Ricoeur, Paul, et al.. *The Riddle of the Past*. Trans. Qi

- Jiafu.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 [Robinson, James Harvey. *The New History*. Trans. He Bingso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2.]
- Ryle, Gilbert. *The Concept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Tocqueville, Alexis d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Feng T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7.]
-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Tonnies, Ferdinand. *Community and Society: Basic Terms of Pure Sociology*. Trans. Lin Rongyu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9.]
-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Tosh, John.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Trans. Wu Y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4(2015): 127—30。
- [Wang, Qingjia. “An ‘Emotion Turn’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Emotions.”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4 (2015): 127-30.]
- 许子东:《许子东讲稿(卷一)重读“文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 [Xu, Zidong. *Selected Lectures of Xu Zidong. Vol. 1: Rerea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1.]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168页)

- [---. *Sandalwood Death (Tanxiangxing)*.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南帆 刘小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Nan, Fan, and Liu Xiaoxin.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Trans.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江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 [Wittge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Eth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iang Yi. Hangzhou: Zhe 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 [Wood, James. *How Fiction Works*. Trans. Huang Yuanfan.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谢有顺:“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当代作家评论》5(2001): 20—26。
- [Xie, Youshun. “When to Die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o Live: An Analysis of Humanity in ‘Sandalwood Death’.”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01): 20-26.]
- 阎连科:“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语文教学与研究》1(2015): 75。
- [Yan Lianke. “God and Life Choose Those Who Feel the Darkness.”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2015): 74-76.]
- 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
- [Yu, Hua. *Xian Shi Yi Zhong (One Type of Reality)*.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
- [---. *There is No Road Duplicated*.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周宪主编:《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Zhou, Xian. ed. *The Radical Aesthetic Thrust*.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责任编辑:王嘉军)